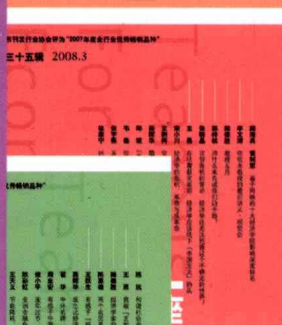


经济学家茶座

合订本

第33—36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



经济学家茶座

合订本

第33—36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合订本. 第 33~36 辑/金明善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209-05080-7

I. 经… II. 金…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6302 号

责任编辑 董新兴

封面设计 李海峰

经济学家茶座(第 33~36 辑)合订本

主编 金明善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网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电话:(0531)82098027 82098028 82098021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装

规 格 16 开(170mm×228mm)

印 张 40

字 数 640 千字 插 页 13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数 1-4000

ISBN 978-7-209-05080-7

定 价 5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0539)2925659



经济学家的显与隐

董国政

用百度搜索一下,与“经济”相关的网页近亿个,与“经济学”相关的亦有4000多万个。查阅2002~2008年(1月)新华社稿库,在总共50.15万篇稿件中,与“经济”有关的达12.79万篇,五分天下有其一。经济及经济学之显不言而喻,说经济学是当下中国的一门显学,并非溢美。

在习惯上,人们将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并列,统称经济与社会生活。若问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是一种什么关系,一时还真难以厘清。鱼和水,水和鱼,抑或……

今年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含义的年份:改革开放30年。若开启国人对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记忆之闸,不难发现,那时候的社会热点是哲学、文学。人们追的是萨特、卡夫卡、马尔克斯,很少有人去追德鲁克或弗里德曼。

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经济一旦昂首,社会必接应之,推展之,反作用之;经济学必随经济之显而显,与时俱进,与时俱进。

经济学既是理论之学,亦是应用之学,思想之学,政治之学,道德之学,社会之学。一言以蔽之:济世之学。大矣,其为学也;显矣,其为家也。

人们乐于把经济学家视为大夫——不断为市场(经济)把脉开药方。在这个语境下,经济拟人化了。在很多情况下,经济与人确很近似:身子骨脆弱,动辄感冒发烧,弄得不好,就要大病一场,元气尽伤。

对经济学家来说,显固然好,却也带来不少麻烦——能否经受得起时间、市场、政府、公众甚至理论架构本身的考验,均非轻松事。

佛家修行有很多难,其中就有“入定难”。经济学之炙手可热使经济学家亦面临一个“入定难”的问题:毕竟,我们现在进行时式的经济模式无成例可循、无定见可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0个经济学家,却有11个观点”。

有显必有隐。人类不断扩张的欲望,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和依赖,经济学分久必合之大势,国家发展的无限张力,各种利益对“丧家犬”的诱惑,均似经济学家背后的隐。

既彰其显,又显其隐,变神坛成为交叉小径的花园,诸如此类,乃《茶座》之“秀功”否?



经济学家茶座

(第33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 伟

刘方斌 刘国光

刘德久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 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 晓

顾海良 梁小民

程恩富 蔡继明

主 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系列《茶座》编辑部主任
《经济学家茶座》项目负责人

董新兴

编 辑

陈丹丹

【卷首语】

董国政 经济学家的显与隐 /001

【国是我见】

翟 华 中国不再例外 /004

徐康宁 “软实力”的背后是什么? /008

朱恒鹏 医保的困惑

——关于医疗改革的虚拟对话之二 /011

荆林波 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困惑 /019

【学界万象】

聂辉华 权威教材会不会破坏学生的创造力? /024

陈乐一 教授高薪悖论 /030

皮建才 强迫发表真的是悲剧吗? /036

【学问聊斋】

曹利群 农村分工的“惊险的一跳” /040

章 元 问世间“社会资本”为何物? /044

王永钦 制度密集型产业 /048

胡夏香 经济研究中的数学运用 /052

【经济随笔】

王松奇 农村调查散记之二 /055

刘福寿 我们的业余时间属于谁? /062

咎廷全 制度边界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65

【经济评论】

陈 宪 市场发育了,社会怎么办 /067

赵 泉 房地产市场的炼金术 /071

赵 刚 一升一贬话青蚌 /076

孟 昌 如果房价计入了 CPI /086

何方也 公平的塑料袋 /089

【生活中的经济学】

高明华 “面子”与公众利益 /091

蒲勇健 恶棍为何变施主 /096

顾海兵 自动取款机服务的消费者观察 /100

暨佩娟

王玉霞 谁锻造了“马路杀手”? /107

柯华庆 父亲的缺点 /111

【经济学人】

叶 坦 景行化雨 史通古今

——追思赵靖先生 /113

陆兴龙 从史料中追寻历史

——记张仲礼先生的学术研究 /120

【经济书评】

李华芳 评格林斯潘回忆录《动荡的年代:历险新世界》 /125

聂日明 弥足珍贵的茅于軾 /128

【他山之石】

张晓晶 哈佛散记(五) /131

高新军 美国地方政府的市长到底有多大的权力 /137

陆 铭 城市的和谐与发展

——法国、比利时城市印象 /144

赖德胜 “新日本”之新 /150

詹 坚 日本、韩国争食北京奥运蛋糕 /154

董志凯 访越札记 /1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 第33辑

金明善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3

ISBN 978-7-209-04425-7

I.经… II.金… III.经济学

-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第 025513 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0531)82098906

E-mail:chazuo4901@126.com

发行部电话:(0531)82098027

邮购电话:(0531)82098021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172×232 毫米 16 开

10 印张 160 千字

邮发代号 24-180

定价:14.00 元

中国不再例外

翟 华 *

“中国例外”这个词,近年来常常出现在国内外媒体的财经报道中,比如论及各国经济的经济增长率低迷,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电脑销量不理想,或者汽车工业停滞时,都会马上跟上一句“只有中国例外”。这样的报道看得多了,作为中国人的我也多少有点忘乎所以。有一次见到一位某国际金融机构专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指导的西方经济学家时,我向他提了这样一个含有建议性质的问题:“是否能够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向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决策者推广呢?”这位专家想了一会儿说:“可是,中国是一个例外呀。”

如果今天再向这位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同样的问题,他可能给出不同的回答。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已经任命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为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可以说一向由西方经济学家主导的世界银行承认了自己的无能,正式确立了“中国式扶贫”为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中国经验不再例外。

中国人喜欢说“稳定压倒一切”,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则奉行“扶贫压倒一切”。2000年,在联合国主导下国际社会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争取到2015年将世界上的贫困和饥饿程度减轻一半,同时致力于改善母亲的健康状况、实现全球基础教育、促进性别平等为妇女赋权、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降低儿童死亡率并建立全球发展合作伙伴关系。时间过去了一半,很多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一目标的进度缓慢,按照目前的速度将难以按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在我看来,“千年发展目标”进展不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扶贫”成了国际社会的“形象工程”,而不重视实际效果。一些发达国家和援助机构过分注重宣传效应,忽视实际效果。2003年“非典”在一些国家包括发达国家流行,一时间老百姓草木皆兵,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于是发达国家和国际援助组织纷纷承诺大笔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防控和治疗“非典”。然而“非典”过后,很多承诺的资金和

* 作者系亚洲开发银行项目官员。

援助项目也失去了紧迫性,甚至不了了之。发达国家和援助机构对于“非典”的热情与对疟疾的冷漠形成了鲜明对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在非洲,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疟疾,其中相当部分为幼年儿童,每天因疟疾死亡的非洲儿童高达3000人。换句话说,大约每隔30秒钟就会有一个非洲孩子因为疟疾死去。如果说,“非典”的恐慌在于其未知性和潜在的威胁,而疟疾是一个早已被人类认识的疾病,有药治疗,也有办法预防,而且成本不高。在坦桑尼亚进行的一个试点项目显示,只要让儿童睡在经过消毒的蚊帐里,因疟疾而导致的死亡率就会减低一半。所以疟疾的可怕,就在于国际社会的漠视,也正是因为人们的麻木才让疟疾肆虐非洲大陆多年而得不到控制。

以“扶贫”的名义,几年来大大小小的国际会议数不胜数,各种各样的研究报告成了书架上的装饰品。在一次国际扶贫会议上,一位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对我开了个苦涩的玩笑:“你知道吗?我们印尼人是第一个上月球的国家?”看我大惑不解,这位代表说:“把这么些年来各方面专家撰写的扶贫报告摞起来,也就差不多到了月球了。”我们在一起还算了一笔账,这样一次高规格的国际扶贫会议,即便是每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只派5个人与会,就差不多是1000人的大会。不算与会者的国际旅费,也不算组织会议本身的各类花销,就是在开会期间代表的食宿也要花上大约100万美元。如果用世界银行的标准,平均每人每天的收入不足1美元就是贫困户,那么如果把开会的钱省下来捐出去,足够让发展中国家一个3000人的贫困村过上一年好日子。

在工作中,我常常与非洲各国政府官员打交道,每次说到中国与非洲的关系,我总是习惯成自然地说我们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而这些非洲官员也总是发自内心地补充一句“中国是我们的好榜样”。记得当年我经常和非洲同事出差,每当来到欧洲发达国家,看到眼前的繁华,对比家乡的落后,这些非洲同事总是忍不住叹气:我们非洲大陆不知道要用几十代人的时间才能达到这样的发达程度。后来,当这些非洲同事来到中国,看到从南到北一派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突然意识到,只要走对了路子,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完全有可能消除贫困,经济发展也是可望又可及的愿景。这样,在非洲朋友们眼中,中国用实际成果为非洲树立了一个“发展是硬道理”的榜样。在今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年会期间,非洲多个国家财政部长不约而同地表示中国是同非洲国家合作的好伙伴,中国的减贫经验值得非洲国家学习。非洲人深信,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能做到的,非洲一样也能做到。

非洲国家的这种观点也得到了一些有影响的知名经济学家的认同。被誉为“当代凯恩斯”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先生在上海参加了非洲开发银行年会之后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为世界银行提供范本》(China's lessons for the World Bank)的文章。文章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受美、英等发达国家政策导向的影响,在非洲和世界其他贫困地区倡导自由经济,主张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服务,推动基础设施的全面私有化。25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没有出路的错误路线,非洲经济至今依然深陷泥沼之中。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大力投资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和电力,从而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创造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奇迹。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非洲国家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发展的模式,决计增加基础设施、农业、健康和教育方面投资,并且得到了中国政府和投资者的大力协作。萨克斯认为这对于非洲来说是个 good news (好消息)。

在非洲国家普遍把中国的发展模式视为典范的情况下,作为“榜样”的中国也应该自我审视,认真考虑如何在国际社会承担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建立支援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思维,为全世界的扶贫事业做出较大的贡献。我在国际组织从事发展援助工作多年,在这里想以个人的经验和体会为这个新思维的建立提供两点粗浅的看法。

首先,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尽管全世界公认30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成功的范例,但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经济发展理论模式,基本上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曲折和渐进过程。许多非洲朋友一提起中国发展经验来只知道“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甚至误以为中国的发展是权力集中和计划经济的结果。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本身也面临着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模式自身也亟须充实和完善。我建议国内学术界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如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对过去30年来中国和非洲的经济发展轨迹做一个详尽的实证研究,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理论模式,让“中国模式”进入清华、北大、哈佛、牛津的经济教科书,成为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建议和技术援助的必读手册。

第二,我们也应该承认,尽管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在总体思路上进入了误区,但是毕竟还是在多年的实践中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财务、经济、环境以及社会评价体系和管理方式。举例来说,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的项目,在项目拆迁移民问题上有一个维护弱势群体的“既得利益”原则,在贷款条件中要

求在工程开工之前一定要为受到项目影响的移民提供不低于原生存水平的居住和生活条件,这是一个硬指标。我认为,在建立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模式的基础上,无论是中国政府的官方援助还是民营企业的商业投资,都应该借鉴世界银行的这一套管理模式,让旧瓶装新酒,在选择投资项目的时候不仅考虑资本回报率,也注重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方案,在和谐社会中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化解国际上对中国、对非洲援助战略的疑虑甚至误解的有效手段。

当然,用“捐助”的方式也不可能根本解决贫困问题。大学的营销学课程里常常引用一个国际制鞋公司在非洲做市场调查的故事。据说该公司派出市场调研人员去了非洲某国,结果发现土著人不穿鞋,于是一组调研人员做出了在这里卖鞋没有市场的结论;而另一组调研人员则认为正是因为当地人不穿鞋,才证明本公司的产品将有广泛的市场。一些以“千年发展目标”为己任的国际援助组织的思路却与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同。在他们看来,穷人“不穿鞋”是因为没有人送鞋上门,所以把“送鞋”作为工作重点,却没有考虑当地人为什么不穿鞋,送的鞋是否合脚,鞋穿坏了以后谁还会接着送?这种“送鞋上脚”的援助方式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长此以往也造成了发达国家的“援助疲惫”(donor fatigue),对“贫穷陷阱”(poverty trap)束手无策。

“援助疲惫”和“贫穷陷阱”这两句国际社会流行语,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小故事。农民的一头驴掉到了枯井里,无论是用绳子、梯子,都没有办法把它救起来。绝望的农民最后决定放弃,反正驴也救不上来,枯井也没有什么用处,干脆开始往井里填土,让驴入土为安吧。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每一铲砸到驴背上的土,它都凭着自己的悟性迅速地抖落下来,然后用蹄子踩实。结果就这样,没过多久陷阱中的驴竟把自己升到了井口,借着天时地利人和自救成功。这个故事值得国际社会从事发展援助工作的专家和决策者们深思。对于长期处于“贫困陷阱”中的百姓而言,援助机构派来的直升飞机、重型吊车都无济于事,食品和药品也只能解决燃眉之急,最关键的是要找到因地制宜的方法,让贫困人口脚踏实地地自我提升,自己找到走出陷阱的路子。

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式扶贫的理论和经验,林毅夫先生任重而道远。



“软实力”的背后是什么？

徐康宁*

“软实力”这个新名词越来越流行了，不仅在大众传媒上的出现率越来越高，而且常见于一些严肃的学术文献中。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冷战”结束以后，影响国际关系的格局以及决定各国的国际地位，更多的是靠“软实力”。经常看报章杂志，可以见到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比较强大了，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当务之急是要提高“软实力”。政府也很相信这种观点，越来越多的“孔子学院”在海外成立就是一个例证。

推崇“软实力”理论的学者往往以美国为例，列举美国的好莱坞大片、NBA、乡村音乐甚至美式英语如何了得，影响了全世界，起到了美国经济或物质产品无法起到的国际影响，巩固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增强了美国的国际“话语权”。还有的学者以“韩流”的兴起为话题，感叹泱泱大国，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却没有用于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于是，国内舆论界存在一种急切的希望：向世界输出更

多的“姚明”等文化符号，以增强中国的“软实力”。

“软实力”一词的英文表述是 soft power，其基础是 power，显示的是一种力量（force, strength），甚至是一种权威。我们知道，在国际关系中，在国与国的相处交往中，力量常常是在竞争中获得的，凭借一种力量可以让别国折服，甚至敬畏，这种力量就上升到了一种权威，开始成为真正的难以撼动的力量。换句话讲，在国际关系中的实力一词，带有权威、统领甚至某种霸气的意思。所以，在英语中，超级大国被称为 super-power。

当我们注意到一些国家“软实力”强盛时，更应了解这些国家的“软实力”为什么强大起来，在“软实力”的背后有些什么。

从历史上看，但凡有过显著“软实力”的国家，都曾有过辉煌的“硬实力”，在世界的发展史上留下过鼎盛印记。古埃及和古希腊都曾经有过“软实力”的黄金时期。古埃及的金字塔，古

* 作者系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希腊的神殿建筑和这个国家所特有的浓郁的思辨民风，都给当时和后来的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今我们还能从一些当代经典建筑中看到金字塔和神殿的历史光芒，哲学家的思辨逻辑也时不时出现在今天知识分子的意识流之中。可是，当古埃及的金字塔变得残破不全，古希腊的神殿倒塌之后，这种“软实力”就主要体现在大英博物馆内的展品和陈列上了。若这就是“软实力”的话，埃及和希腊今天仍然拥有这种“软实力”，但如果这两个国家要想靠此来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话，倒真是一个“国际玩笑”了。

记得曾经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名字记不清了，内容讲的是一个希腊移民家庭对待儿女婚事的态度。父亲在美国一城市开了一家希腊餐馆，女儿到了出嫁年龄了，父亲并不急着嫁女儿，反而要女儿继续在餐馆里干活，等于是免工资伙计。一段奇遇发生之后，一位非常帅气且有社会地位的美国男性白人开始追求女儿。父亲既看重未来女婿的社会条件，又不想女儿跟他走，对未来女婿并不友善。电影里有这样一段场景：女婿为了讨好丈人，和他谈论古希腊文化，丈人并不领情，绷着脸用对方听不懂的希腊语说：我的祖先在讨论文化的时候，你的祖先还在树上呢！最后的结局是喜剧式的，父亲拗不过女儿对爱情的追求，也是出于世俗的目的，不想放

走金龟婿，大家各得其所。

“软实力”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影响力，包括这种力量所承载的思想、意识、潮流、价值观等。我们在重视思想观念、大众文化影响一个国家的国际舞台表现的同时，还是要看到，“软实力”不是空中楼阁，一定有依附之物，这个依附物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硬实力。说到底，“软实力”还是上层建筑，其根基还是在于经济。三十年前我刚上大学的时候，一位教英语的老师是20世纪上半叶的毕业生，以能说一口牛津腔为荣，有点看不起说美式英语的同行，认为那不够“档次”。今天，大量的英语培训广告上，“美式英语”成了一个不小的“卖点”，好像很少看到“纯正牛津腔”这样的广告用语。“牛津腔”竞争不过“美式英语”，不是语言本身的力量，而是国强国弱的符号。

我们从“韩流”的形成与变化也能看到所谓“软实力”的渊源。“韩流”的兴起绝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其背后有丰富的经济社会内容。我们对韩国并不陌生，即便是在中韩建交之前，我们也从朴正熙统治之下的“南朝鲜”以及后来的“汉城奥运会”中看到一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轨迹。那个时代，除了汉城奥运会上的一首主题歌外，韩国的文化在中国影响并不大，远远不如日本文化的影响。短短十几年，“韩流”能成势，固然离不开韩国文化官员



向国际社会的刻意推广,但依我之见,成功背后,三分文化,七分经济。即便是在亚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征,有印度的,有泰国的,有越南的,为什么单单韩国文化流行于天下?还是这些文化,为什么二十年前未成气候,现在却席卷亚洲?韩国在一个较短时间内爆发出来的经济强势、经济繁荣引起亚洲其他地方居民对其民众生活的羡慕,由羡慕物质生活转而喜爱其文化,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关键还在于亚洲其他国家原来并不落后于韩国,现在却有了巨大的发展落差,因而更容易产生了解韩国的兴趣。最近几年,“韩流”有所退潮,也和韩国经济不够“抢眼”有关。韩国新总统很务实,不谈虚的,竞选时以民众最想听到的口号打动人心,提出了“747”的国家目标,即要达到 7% 的经济增长,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4 万美元,10 年成为世界第 7 经济强国。该目标是否能实现另当别论,但这一招果然有效,韩国民众还是更加看重硬实力。

当一个国家的财富力量还不足以让别的国家折服的时候,当一个民族的生活尚未富足到让别的民族羡慕的时候,过分强调“软实力”常常事倍功半。我们绝不要以为 NBA 中有了个姚明,美国民众就对中国有了好感。美国的 NBA 文化是全球性的,来自中国、俄罗斯或阿根廷的球员,对于美国观

众而言,就像是在佛罗里达州看球时看到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球星一样。圣诞节在中国越来越普及,在中国过圣诞节的年轻人,真的是身心投入,激情高涨,因为过节的人感到这是一个来自先进发达社会的文化符号。我曾经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过了一次春节。那里的春节主要是唐人街热闹,虽然也吸引了不少当地人,但看得出来,当地人前来是凑热闹。大人带着小孩看中国的耍狮子,是出于一种好奇。看完回家,对中国的印象也基本如此,不会有多少人因为看了中国的舞狮子以后就开始愿意接受中国文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应当提及,对中国文化有好感的外国知识分子、政治家和外国民众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出于一种个人偏爱和专业喜好,而后者才是真正群体性的;在外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中,喜爱中国文化和喜爱中国又不是一回事。澳大利亚新总理陆克文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被国内媒体说成是有中国情结的政治家,这些媒体不免有些自作多情。陆氏上台,首先是向美国示好,急切表达紧密关系,而不是先和中国打招呼。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纪念年,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如果说我们今天有点基础可以讨论“软实力”的话,那这个基础还是靠发展市场经济换来的较为殷实经济实力。

医保的困惑

——关于医疗改革的虚拟对话之二

朱恒鹏*

对公司实施综合性改革以后,朋友一直很忙。直到数个月前,他才有空找我聊天,很自然的,话题集中到了他的综合改革上面。

一、免费医保的困境

“综合改革的效果如何?”一见面,我就直奔主题。

“公司食堂、商店以及其他一些服务性部门完全按照我们上次确定的方案进行了改革,效果相当理想。基本和我们当时预期的一样。不过,职工医疗保障这一块的改革效果很不理想,我正为这事闹心呢!”

“别着急,先说说公司食堂你是怎么改的?”

“和我们上次讨论的方案基本一样。回去后我就把公司食堂给拍卖了,它现在已经成为一家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快餐店,和我们公司没有了任何隶属关系。

“此前维持这个食堂运营每年公司需要支出1亿多元,平均在每个职工身上每年花费6000元。拍卖了厂办食堂从而取消了免费工作餐后,我把这6000元以现金方式发放到每个职工个人手中,也就是每人每月的工资中增加了一个500元的伙食补贴,直接发到工资卡上。而他们的伙食则完全自理。现在的情况是,那些中午有两个小时休息时间的职工,即所谓的白领,通常选择打电话叫外卖,或者到街上的饭馆去吃,反正现在他们是花自己的钱吃饭,不用公司操心。你别说,他们挺满意这种做法。”

“那是自然。我猜自你这次改革后,你们公司周围新出现了一批价廉物美的小吃店、快餐店,那家独立出去的食堂现在也成了一家饭菜质量不错、服务态度很好、价格适中的快餐店。”

“的确如此。过去在厂办食堂时一脸横肉、隔三差五和职工打架的那些大师傅们,现在态度那叫一个好!脸上的笑容像弥勒佛似的。

“对于那些在生产线上工作、中间休息时间较短的工人,我们选择的是送餐到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该文是《经济学家茶座》第32辑中《免费的午餐》的下篇。

车间的办法,通过招标方式,公司把这一业务外包给了市场上的三家快餐店,每餐有十种左右的工作餐供职工选择,每份工作餐价格在10~20元之间。职工自费购餐,自由选择。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定期征询工人意见,一旦工人不满意,立刻更换供餐店。满大街是快餐店,竞争激烈着呢,谁也不可能‘套牢’我们。恰恰相反,面对我们这样的大客户,他们巴结还巴结不过来呢。因此,我们总能在同样的价格下,拿到质量最好的工作餐。所以,生产线上的工人对这一改革也挺满意。你别说,这一做法既解决了饭菜质量问题,又解决了过去一直无法解决的浪费现象。”

“这很正常,现在工人花自己的钱买饭吃,怎么可能再浪费?你再说一说厂办医院和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是怎么改的?何以效果不好?”

“今天我要和你仔细聊一聊这个问题,你也帮我出出主意。”

“你知道,我们公司原来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厂办医院,医院运转经费由公司全额提供,公司职工在这个医院看病,不管是门诊还是住院,基本是免费。”

“这个经费由公司全额负担,职工免费看病的厂办医院存在着和公司食堂几乎一模一样的毛病:运营费用连年快速上升,设备、药品、经费浪费严重。医院人浮于事,医务人员没有工作压力也缺乏工作动力,业务上不求进取,工作上得过且过。公司职工对医院的服务态度、医疗水平意见很大。医院员工的亲朋好友,尽管不是我们公司的职工,也在这个医院免费看病、吃药,甚至住院。至于贪污、收受药品回扣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屡禁不止。”

“而在职工方面,由于是免费看病,浪费现象也很严重。泡病号、开假病条,一个人在公司工作,全家人甚至七大姑八大姨都在我们厂办医院免费看病。有些职工甚至从厂办医院拿了药品再转手卖给外面的药品贩子。这些行为,在普通职工中普遍存在,而公司的一些领导干部甚至更为严重,医院的工作人员对此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主动配合。”

“这些年来,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公司领导层花费了不少心思。引入监督机制,实行成本约束,可是收效甚微。表面上看监督制度和成本控制制度都很完善,可是具体的监管部门根本不认真执行。最终我也明白了那些监管人员的真实想法:监督管理这类工作,费心费力得罪人,个人又得不到什么好处,何必太认真?都是一个公司的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真要较真儿去监督甚至处分别人,还怎么在这个熟人圈子里混?况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饶人处且饶人,日后有机会别人也会投桃报李。所以,所谓监管,最终的结果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达成默契,监督者假监督,被监督者假执行。实际效果一点儿也没有。因此设置这些监管机构不仅没

能起到降低医院运营成本的作用,还凭空增加了公司的管理成本。

“鉴于上述结果,我也曾经进行了一些所谓的‘市场化’改革。不再对医院实行全额补贴,而是改为定额补贴,要求医院自负盈亏,结余归己,超支自理。同时对医院的业务进行改革,实行‘双轨制’:一方面,医院的基本业务是向本公司职工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服务,这部分业务公司以定额补贴的方式予以补偿。另一方面,允许医院向本公司员工提供盈利性的特需服务以增加收入,同时也允许医院在有余力的情况下面向社会提供收费服务,以增加医院收益,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事实证明这种双轨制模式存在很大问题:首先,由于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很难计量,因此公司不可能根据医院向本公司职工实际提供的医疗服务数量和质量来支付补贴,最终实行的只能是一个定额总量补贴,这一定额补贴事实上成为医院一个和业务量无关的固定收入。在这种条件下,医院多向公司职工提供一份免费服务,并不能增加得自公司的补贴,但却会增加医院的成本。因此在医院自负盈亏、追求盈利的情况下,面向本公司职工的这部分免费业务实际上已经成为医院不愿意承担的赔本业务了。这一结果体现到医院和医生的工作行为上,就是尽可能少提供甚至不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服务。具体的表现是,当职工到医院免费看病时,排队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好大夫基本见不到,大夫看病的时间越来越短,态度和质量越来越差。一句话,免费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明显下降。另一方面,医院有意诱导职工消费收费的特需服务。特需服务质量的确好,好大夫、好设备、好药品、好态度,当然特需服务的价格也的确高。医院的这种行为很容易理解,因为特需服务盈利,医院自然愿意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特需服务。但医院这样做,实际上是把公司投资配置的本意是让本公司职工免费使用的设施、设备和大夫用于医院牟利,公司职工怎么可能没有意见?面向社会的那部分收费服务情况类似,同样挤占了医院大量资源。因此,在这种双轨制下,医院面向本公司职工的免费医疗服务供给明显不足,而高收费的特需服务则明显过度。此外,部分公司管理人员利用特权免费享受高质量的特需服务。当然他们会利用自己控制的公司资源对医院或者医务人员投桃报李。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整个医疗费用支出并没有下降,尽管给医院的定额补贴没有明显增加,但是加上各种以间接方式或明或暗地流入到公司的资源,公司的整个医疗支出实际上有很大的增加。

“而职工方面,由于免费的医疗服务供给明显不足,不得不自费购买特需服务,个人的医疗负担明显增加,因此意见很大。这严重影响了公司职工的向心力和劳动积极



性。医生的收入尽管有所增加,但是医患关系严重恶化,挨骂甚至挨打现象时有发生。看起来受益的只有医院的管理人员和公司里负责管理医院的那些部门和个人。”

二、医疗不是请客吃饭

“那你又是如何进一步进行改革的?”我禁不住问道。

“咱俩上次聊天后我意识到,表面上看食堂和医院的业务活动差异很大,但两者存在的问题实质上是一回事,根源于同样的制度弊端。

“因此,在对食堂进行改革的同时,我对医院和职工医疗保障制度也进行了同样的改革。整个改革实施下来,食堂等服务机构的改革效果非常好,公司和职工都很满意。但医保制度的改革效果却很不如意,职工意见很大,而公司方面的这部分财务负担还进一步加重了。”

“说说医院和职工医保具体是怎么改的?”

“和食堂的改革方式一样。

“首先是把医院从公司中剥离出去,让它成为一个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医院。公司不再向其提供任何补贴,它也不再承担免费或低价向公司职工提供医疗服务的职责。

“然后是把此前每年用于供养厂办医院的 5000 多万元平摊到全体职工身上,每位职工每月增发 200 元的医疗补贴,和工资一起发到职工个人手中。同时明确表明今后公司不再负责职工的医疗问题,职工看病费用自理。

“我本来以为:公司把过去花费在职工医疗上的钱全部发到职工个人手中,职工没有受损;今后看病自费,也就不会再有浪费行为;医院完全走向市场、自负盈亏了,自然也就有动力提高效率了;公司不必再管理医院了,节省了管理成本,提高了管理效率。这样的改革应该对各方都有利,然而实际结果并不是这样。”

“出了什么问题?”

“就职工而言,问题主要出在那些身体较差、特别是有慢性病或者必须住院的职工身上。对这些职工来说,公司发放的医疗补贴根本不足以补偿他们现在需要完全自理的医疗费用。因此和改革前相比,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从而实际生活水平事实上是下降了。这些职工自然对这一改革非常不满。

“对公司来说,尽管在将医疗补贴货币化以后明确表明不再承担职工的医疗费用。但实际上这一点根本无法做到。对于那些医疗费用很高、自身难以承担的职工,公司怎么可能完全置之不理?因此还是需要适当地为这些职工承担部分医疗